

##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

储著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是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探索完成时期。这个时期,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文革”结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前,胡乔木提出“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科院成立现代史研究室;第二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至1982年底,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启动,中国社科院拟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的建议未被采纳;第三阶段,自1983年至1990年底,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学界在探索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十余年时间里,始终贯穿着明确的学术自觉意识。这是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重要思想保证。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当代中国》丛书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1)01-0162-07

“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简称“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探索完成时期。这个时期学界重新提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并试图建立专门机构来推动国史研究。<sup>①</sup>1990年,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学界是怎样认识国史研究,并为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做过哪些努力?尽管这些问题在国史研究学术史论著中常被提及,但对其演进过程则语焉不详。<sup>②</sup>笔者认为,学界对于“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问题实有重新讨论之必要。

### 一、1976—1978年:“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文革”结束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生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使遭受极大破坏的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得以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大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成立或恢复,保证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顺利展开。1977年5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

<sup>①</sup>20世纪50年代,学界就提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并产生初步成果。参见储著武:《关于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再认识》,《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6期。

<sup>②</sup>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史研究成果不少,如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朱佳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宋月红、王爱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四十年》(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李正华、秦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的缘起、发展与展望》(《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等。

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以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胡乔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到任后立即着手考虑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发展的问题。<sup>①</sup>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任务着重提出来。

1977年11月10日，由胡乔木提出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临时领导小组名义向国家计委报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规划初步设想》指出：“在研究和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要写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史、土改运动史、三大改造运动、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经验总结、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等专著。”<sup>②</sup>在这个设想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提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制订本院三年和八年科学研究规划，并联合教育部等机构制订全国历史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这些规划都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任务。

#### （一）“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78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制订三年和八年规划动员会。胡乔木在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sup>③</sup>所谓“赶快着手研究”，具有双重意蕴：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个空白领域，值得研究；二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具有紧迫性，要尽快进行。作为共和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胡乔木的倡议体现出他敏锐的学术自觉意识。1978年2月，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共同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其中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及各种专题著作，如“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对‘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批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等。<sup>④</sup>2月21日，胡乔木拟订一份《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的设想。<sup>⑤</sup>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拟成立国史研究机构，这本身意义就不一般。3月，有学者建议编写中国共产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sup>⑥</sup>6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决定直接承担《毛主席的生平和思想》《中国革命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书的写作任务，强调“《毛主席的生平和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两书，争取明年写出梗概，以应庆祝建国30周年的需要。”<sup>⑦</sup>

随着学界提出赶紧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任务，成立国史研究机构便提上日程。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开始并没有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而是转向成立现代史研究机构。当时学界认为，中国现代史是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中国现代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78年5月，史学界提出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指出：“中国历史现代部分断限至1957年，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涉及的最后时间。”<sup>⑧</sup>李新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直到现在。……中国现代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属于通史性质的，应该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要反映出整个社会的面貌，所以它的分段就与中共党史的分段不完全一致。”<sup>⑨</sup>6月12日，中国社科院向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呈报《关于拟增设新所和拟增编200人的请示》，其中准备筹建的新研究所有“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并指出“虽有近代史研究所，但从未研究过五四运动以来和建国以来的现代史，原有的机构也不适宜于担负这项任务。”<sup>⑩</sup>7月15日，李先念批示“拟同意”。<sup>⑪</sup>以此来看，中国

①朱佳木：《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初创时期的二三事》，《光明日报》2012年5月30日。

②③④⑤《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254、259、264页。

⑥社任之：《实事求是 大干快上》，《光明日报》1978年3月30日。

⑦⑩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汇编·2（1978年上卷）》，内部编印，第310、312页。

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油印材料，1978年5月印。

⑨李新：《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主要谈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郭德宏主编：《百年风云——中国现代史学会30年论文集》，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社科院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转向成立现代史研究所,源于人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国现代史范畴具有一致性的认识。即便是这样,中国社科院也没有成立现代史研究所,而是先着手成立现代史研究室。1978 年 11 月 7 日,中国社科院发出《关于成立现代史研究室的通知》,指出:“经国务院批准,我院新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11 月 22 日,该室印章正式启用。<sup>①</sup>很显然,现代史研究室得到国务院批准,其级别与地位自然不一般。“这个研究室是直属院部的与所平行的机构。除科研工作外,其他工作则由近代史研究所代管。”<sup>②</sup>

## (二) 全国历史学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的国史研究

1978 年 6 月 13—1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天津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座谈会。这次会议修改制订《1978—1985 年历史学科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修改稿)》《1978—1985 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规划草案》《1978—1985 年中国近代史(1840—1949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年— )选题(初稿)》,其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了初步规划。笔者收集到一份形成于 1978 年 11 月的《1978—1985 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规划草案》,在“重点著作项目”中提出由廖盖隆负责“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李新负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19—1949 年)”、黎澍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史(1949—1979 年)”,在一般著作项目里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抗美援朝战争史、“文化大革命”史等。<sup>③</sup>

1978 年 9 月 11 日至 2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在京联合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胡乔木在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近三十年来也有许多伟大的发展。认真研究这些课题,我们就可以在世界学术工作中作出特有的贡献。”<sup>④</sup>周扬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三十年了,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二十多年了,我们还没有一本根据新中国经济建设经验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还没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sup>⑤</sup>会议通过《哲学社会科学八年(1978—1985)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确定的 25 个重点研究项目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的研究”,并指出:“有些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并准备撰写专门著作,如《毛主席的生平和思想》、《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四人帮’批判》、《政治经济学》、《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论现代帝国主义》等。”<sup>⑥</sup>应该说,这次会议对于国史研究做出了规划,并要求相关单位会后贯彻落实。

简言之,“文革”结束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学界明确提出要“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始打算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后来转向成立现代史研究室。有学者指出:“限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并没有很快创办起来。但胡乔木已经请黎澍带领几位学者着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准备。”<sup>⑦</sup>但是,现代史研究室成立后将工作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方面,对于国史研究推动作用有限。

## 二、1979—1982 年:编写《当代中国》丛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必须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来安排工作。具体到国史研究方面来说,1982 年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启动,是国史研究极具标志性的学术事件。

### (一) 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国史

1979 年 9 月 29 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初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汇编·32(1977—2007 年)》,内部编印,第 372、373 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汇编·4(1980 年)》,内部编印,第 376—377 页。

③《1978—1985 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规划草案》,油印材料,1978 年 11 月。

④《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第 283 页。

⑤周扬:《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哲学研究》1978 年第 10 期。

⑥《哲学社会科学八年(1978—1985)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社会科学动态》1978 年第 2 期。

⑦顾为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 30 年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值“文革”结束不久,社会上充斥各种“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尤其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的认识与评价,同新中国史紧密相连,争议也颇多。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新中国 32 年历史,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进行的一次高层次国史研讨,为新形势下开展国史研究提供根本遵循与思想指导。

### (二) 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得到重视

1979 年 3 月 23 日—4 月 2 日,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次会议是否讨论过国史研究的问题,限于材料不足尚难知悉。<sup>①</sup> 10 月,北京地区召开的社会科学界庆祝建国 30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人就认为中国现代史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中国现代史。<sup>②</sup> 1980 年 4 月 8—12 日,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乔木在会上指出:“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不能不研究历史。……这个历史包括当代的历史,即包括历史在当代发展的各个侧面。”<sup>③</sup> 5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 1981—1985 年规划和 1986—1990 年设想》中提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sup>④</sup> 8 月 18 日,中共近代史研究所委员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提出《关于建议筹备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的报告》,提出要以现代史研究室为基础来组建现代史研究所,并指出:“现代史研究所的任务是:研究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并着重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为党做好助手。”<sup>⑤</sup> 这个报告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现代史研究室并入近代史研究所的结果来说,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的建议未被采纳。

### (三) 启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

1982 年以后,在胡乔木积极倡导下,史学界以及有关行业、部门转向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工作。这就使得国史研究落实到更为具体层面。以下简要叙述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情况。

1982 年 5 月 13—18 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召开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胡乔木在会上提出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倡议。会议结束后,中宣部、中国社科院等机构启动丛书编写出版工作。以《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为契机,国史编研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1 月 9 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强调系统地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条件已经成熟,要求中宣部和中国社科院共同负责丛书编写工作。<sup>⑥</sup> 12 月 20 日,《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编辑部工作和丛书编辑出版事宜。编写《当代中国》丛书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国史研究及其学术建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至 1982 年启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是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一次重要转折。嗣后,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将精力集中到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工作之中,暂时搁置了国史研究的学术建制问题。

## 三、1983—1990 年:筹设当代中国研究所

随着《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工作深入展开,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问题再次提出来。尤其是 1989 年,学界掀起总结新中国成立 40 年成就与经验的热潮。在这个背景下,胡乔木、邓力群等又着手成立国史研究机构。

<sup>①</sup>《加强团结调动积极因素 促使中国历史科学发展 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举行》,《光明日报》1979 年 4 月 7 日。

<sup>②</sup>《历史研究必须提倡真实性和科学性 北京地区国庆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史学组总结经验教训》,《光明日报》1979 年 10 月 27 日。

<sup>③</sup>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五十年》,海燕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 页。

<sup>④</sup>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第 53 页。

<sup>⑤</sup>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汇编·4(1980 年)》,内部资料,第 376—377 页。

<sup>⑥</sup>《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 1 册,内部材料,2008 年印,第 4 页。

### (一) 国史研究加快发展

1984 年, 正值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 学界推出一些国史研究论著, 如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文集: 辉煌的成就》上、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等。尽管这个时候学界比较重视国史研究, 也有成果涌现, 但主要是宣传, 学术性不足。198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 40 周年纪念, 如何总结新中国 40 年成就与经验, 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应及早提上重要日程。<sup>①</sup> 还有部分高校历史系推出国史通史著作, 如郭彬巍、谭宗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版), 朱宗玉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陈明显等编《新中国四十年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这是以前很少见到的现象。1989 年 9 月 29 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新中国历史四个方面的基本结论以及需要统一认识的十个方面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以及中共中央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40 年历史的认识与评价, 对于国史学科建设以及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展开起到积极作用。

### (二)《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门机构的建议》的出台

1984 年 8 月 15 日,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向院党组提出《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门研究机构的建议》, 指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以后, 国史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高等院校先后开设国史课, 报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当代中国》编纂工作也全面展开, 这对于推动国史的研究, 都是有利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届 35 周年, 国史的研究工作, 有必要并且应该列入国家科学工作规划, 着手建立专门机构, 创造条件, 准备力量, 为将来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打好基础。

因此, 我们建议:

1、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门研究机构, 名称可叫国史馆,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隶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或由国务院直辖。目前, 可成立筹备小组, 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在筹备小组成立前, 建议现代史研究室仍直属院部, 以便加速完成该室目前承担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序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多卷本)的编写任务, 并协助筹备工作。

2、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工作具有很大的现实性, 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因此, 国史研究工作应由中央直接下达任务; 国史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应该由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中建立功勋、声望素著, 并懂得历史的老同志担任; 编纂工作的负责人, 应该由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修养, 富有学术水平, 并有能力主持编纂工作的历史学家担任。

3、国史研究人才的培训, 亟需着手进行。建议从 1985 年起, 陆续在大学现代史专业毕业生和研究生中挑选一批品学兼优的人才参加国史研究机构。拟每年挑选 10 人, 到 1987 年共 30 人。此外, 在各部委、《当代中国》丛书写作人员中抽调少数同志充实国史研究机构。到 1990 年, 国史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主要是资料人员)拟达到 100 人左右。

4、国史研究工作, 需要全面地掌握建国以来的档案、文献资料。因此, 建议中央档案馆和党政各部门适当地放宽对国史研究人员查阅档案、文件和参加有关会议的限制。

5、研究国史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遵循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同时, 提倡学术思想自由, 允许研究人员在大量占有确凿材料的基础上, 进行实事求是的探索和研究, 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的判断。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前, 应由领导机关审定。

6、高等院校和各级党校, 从事国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员很多, 为了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加强学术交流, 建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会。<sup>②</sup>

<sup>①</sup>刘西芳:《论新中国历史的研究——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而作》,《思想战线》1989 年第 4 期。

<sup>②</sup>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汇编·8(1984 年)》, 内部资料, 第 534—535 页。

这份报告,是由现代史研究室主任陈铁健、副主任李义彬负责起草的。应该说,这份报告对于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问题几乎都有涉及。比如,“国史馆”就明确提出来;《当代中国》丛书与成立国史研究机构的联系。关于这份报告的情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陈铁健研究员指出:“到 1984 年,所长是王庆成,他交代给我说起草一个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机构的建议。王庆成的意思,你写好了,然后交到所里来,修改之后交给胡绳同志。这个文件当时是院里的要报。秘书长梅益有一个批示:这件事情很大。”<sup>①</sup>梅益的批示可理解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专门机构仅仅依靠中国社科院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有更高级别的机构来主持。这份报告作为要报向有关部门上报,但从结果看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 (三)当代中国研究所筹备成立

1989 年 11 月 11 日,胡乔木找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科院负责人胡绳、逢先知、马洪、沙健孙、李慎之谈话,把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任务又提出来。胡乔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多年了。我们应当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共和国的历史。这个问题,我说了一年多了。我准备找力群同志说这件事情。要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我想,中央会赞成的。”<sup>②</sup>胡乔木强调,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要“先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并问胡绳“从什么时候开始能专门干这个事情”。可是,胡绳回答说:“我没有这个组织能力。应该有一个机构,以这个机构为主去做这项工作。”为此,胡乔木表示:“国史、党史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可以成立党史馆、国史馆。两馆实行统一领导。从逻辑上讲,这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可以设想的。”<sup>③</sup>11 月 25 日,胡乔木致信邓力群:“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确实开张营业的时间,以及能立即专门着手调查研究整理资料部署工作的专职人员的调集到位,希望能早日决定了。而且还需要向中央、国务院正式报告请示。我常想,这一辈子实在没有做什么工作,今后也做不了什么,有些早该做而未做的事现在得抓紧些,否则后悔自责晚矣。如能下定决心,盼与胡绳同志恳谈一次,以期落实。”<sup>④</sup>由此可见,胡乔木对于国史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并将其视为应该紧急完成的事情。11 月 27 日,《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总结会召开。邓力群在会上说:“我和马洪同志交换意见,感到目前成立国史馆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是不是可以先筹备。这当然也只是一种考虑,我们和《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的同志及胡绳同志商量过,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同时搞一个名称,就是当代中国研究所。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sup>⑤</sup>1990 年 4 月,邓力群约请胡绳、郁文、曲维镇开会,一致同意筹建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sup>⑥</sup>6 月 2 日,邓力群递交《致李鹏同志和国家编制委员会的报告》,就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编制、人员、学术委员会、刊物、学会等提出具体意见。<sup>⑦</sup>6 月 14 日,杨尚昆、胡乔木、薄一波又联名给中央常委写信:“我们建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行政上和日常工作由社会科学院代管,由邓力群同志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组建和指导。”<sup>⑧</sup>这一报告得到中共中央批准。6 月 28 日,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成立。以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为标志,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自此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步入了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的轨道”。<sup>⑨</sup>

## 结 语

从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成立,到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演进脉络相对清晰。要进一步申述的是,何以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机构最终不了了之?这是因为现代史研究室在

<sup>①</sup>2019 年 6 月 27 日,陈铁健研究员访谈记录。

<sup>②③</sup>胡乔木:《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若干意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5、6 期。

<sup>④</sup>《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55 页。

<sup>⑤⑦</sup>《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第 1 册,第 120、147 页。

<sup>⑥⑨</sup>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5 期。

<sup>⑧</sup>《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第 671 页。

近代史所的重点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方面,而专门搞国史研究的人才较少,学术积累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史研究室不可能很好地开展国史研究。随着时间推移,现代史研究室的建制与人员并至近代史研究所,主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后来,当代中国研究所是在新的基础上另起炉灶成立的,与现代史研究室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与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关联紧密。一方面,编写《当代中国》丛书能够收集整理各个行业、各个方面文献资料,为深入开展国史研究奠定史料基础;另一方面,编写《当代中国》丛书能够团结和组织学术队伍,为开展国史研究准备人力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编写《当代中国》丛书为正式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作出重要准备,在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编修工作同《当代中国》丛书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可以说国史编修工作是在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sup>①</sup>

尤为重要的是,学界在探索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十余年时间里,始终贯穿着明确的学术自觉意识,坚持不懈地推动成立专门的国史研究机构。特别是胡乔木同志,他多次以自己所处的位置来推动解决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问题,“为党领导的国史编研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sup>②</sup>正是因为有这种学术自觉意识,学界才得以最终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发展史研究”(2019mgczd006)及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人选支持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与实践研究(1921—20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储著武(1980—),男,安徽岳西人,中宣部首批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理论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System of National History Studies in the 1970s and 1980s

CHU Zhu - wu

(The Institut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was a period of exploration for the academic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the academic system of the study on national history during this period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from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star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u Qiao - mu proposed to “study immediately”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ASS established the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Room. In the second stage, from the close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1982,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er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arted, and CASS planned to establish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In the third stage, from 1983 to the end of 1990, the academic system of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s a symbol. In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tinuously enhance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cademic system in the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which advanced the academic process on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the academic system; the ser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sup>①</sup>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sup>②</sup>朱佳木:《胡乔木与国史编研》,《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